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美) 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摇主编

姜鹏 董素华摇译

门洪华摇校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摇京

摇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第 号

摇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

摇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基欧汉, 米尔纳主编 姜鹏, 董素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摇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摇 ()

摇 I 国…摇 II ①基… ②米… ③姜… ④董…摇 III 国政治 原研究 原美国 原文集摇 IV 国政治理论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第 ()号

()
 ()
 ()
 ()
 ()
 ()
 ()
 ()
 ()
 ()

摇书 名: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著作责任者: (美) 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 主编摇姜鹏 董素华 译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摇 ()

网 址: () 电子邮箱: ()

电 话: 邮购部 () 发行部 () 编辑部 ()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开本摇 () 印张摇 () 千字

() 年 () 月第 () 版摇 () 年 () 月第 () 次印刷

印 数: () 册

定 价: () 元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委员会

主摇编：赵宝煦教授，北京大学

副主编：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

编摇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门洪华博士，中共中央党校

王摇杰教授，北京大学

王逸舟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缉思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时殷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顾问委员会

主摇任：罗伯特·基欧汉（~~哈佛大学教授，杜克大学~~
委摇员（按英文姓氏笔画为序）：

江忆恩（~~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

彼得·~~哈佛大学教授，康奈尔大学~~

斯蒂芬·~~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

海伦·~~哈佛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凯瑟琳·辛金克（~~哈佛大学教授，明尼苏达大学~~

斯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

总摇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 1919 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 1978 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

2 摇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40 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 1978 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Scott C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67)、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78)、克拉斯纳(Joseph Nye)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Stephen Kocs)和库格勒(William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John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

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8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拉格(Russell J. Liddick)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4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5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拉格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89年,鲍德温(Baldwin)和史密斯(Smith)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Orin Stetter)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5)、斯坦(Stanley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86)、拉格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86)、巴赞和利特尔(Bazant an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86)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

4 摇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后迪和激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84 年,戈尔茨坦(戈德斯曼)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5 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9 年,卡曾斯坦(哈佛大学)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哈佛大学)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

(费丽莫《国际政治学》、费丽莫《国际关系学》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2)、凯克《国际政治学》(1993)和辛金克《国际政治学》(1994)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5)、巴尼特《国际政治学》(1996)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7)、威尔兹《国际政治学》(1998)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9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 50 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 2000 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

6 摇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际关系学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

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4年 8月 8日于京西厂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itongbook.com

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

国际力量压力下的国内政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国内部政治经济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一体化的世界中,国际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介入并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可以说,无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无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被打上的国际痕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与深刻。与此相呼应的是,如何从理论上认识一体化、国际化、全球化、或者相互依赖压力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变迁,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进行综合探讨,就是此项学术努力的一部分,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语文献中三本探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优秀论文集中,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编辑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毫无疑问可以名列其中。^① 与另外两本重要的论文集《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和《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相比,三本书都试图利用比较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意在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人为界限,将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国内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考察。所不同的是,《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关注的是跨国性的社会和制度力量对国内结构变迁的意义,《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则把注意力更

[illegible]

多集中在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双层博弈上,而《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引入的关键变量则是国际化,关注的焦点问题,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不在于探究国际化的原因,而在于国际化的结果^①,也就是说,面对商品、服务和资本加速流动的国际化进程,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国内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者的机会、偏好乃至选择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是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一本重要论文集,参与本书各章写作的作者均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极有建树的著名学者。该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研究文献中的地位和意义,自不待言。该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关注的问题上,于中国学者都有阅读和借鉴的必要。既然谓之导读,无非一要对本书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做一交代和梳理,二能对本书各个篇章逐一分析和评论。至于对各章的分析和评论,两位编者在序章与尾章已有精彩的阐述,所以,下文把重点放在相关理论文献的综述和比较上,对本书涉及的理论框架做一梳理与评价,以助读者更为全面地阅读并认识本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 国际关系研究

摇摇从很多方面看,20世纪 70年代在国际关系研究都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至少在欧美学界,此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是被摩根索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沿用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诸如权力与利益研究、战争与和平分析,大抵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与范畴。进入 7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处于科学革命时期,传统现实主义既受到外围理论的挑战,也受到内部自身变革的压力。内部压力导致后来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大修正,而外围理论,例

[illegible]

如跨国关系研究和相互依赖理论,关注国际政治的经济与非国家因素,为几乎陷入“现实主义沉闷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许多新鲜的血液。新兴的国际关系流派从多学科的途径,而非只将国际政治研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附庸,对国际政治中非国家因素和经济力量给予更多的重视,从而开辟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跨国关系的解释范式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这一流派的代表学者们多半出于对把国际关系视为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附属地位的不满,以及对在这种附属状态下国际关系学到底能有多大解释能力而产生的怀疑。因此,他们力图把国际关系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足以提供对一体化和相互依赖世界中各种新出现的国内或国际现象进行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独特解释能力。1996 年,基欧汉和奈编辑出版了《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对跨国互动与种种组织的作用,跨国关系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跨国关系下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跨国关系对国家中心研究范式(国家利益至上)的冲击,以及跨国关系中间观念的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讨。^①该书对此后跨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相比,其在概念化工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正如后来有的学者所批评的,该书对“跨国关系”这一概念缺乏清晰严谨的界定,把跨国关系定义为世界政治中除了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外的所有内容^②,从而使研究工作包罗万象,无所适从。另外,最为关键的缺陷是,该书还没有能够为跨国关系分析提供足够的概念化准备工作,对跨国关系分析模式的要件,以及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都缺少必要的理论阐述。这些缺陷导致该书描述多于分析,理论概括不够。对概

① 碩鑿則運轉在藻莽齒允壽贈羣龔 漢译 粗駭比其齧其舌同蓋齧译莽齒辛巢齒孕齧譯
悅有實壽藻配爰与陳韻謹識無誤解列译 吳因 援

② 转引自[美]基欧汉、奈著：《跨国关系与全球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恩在《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导论中，基欧汉和奈并没有对跨国关系概念进行完整的辨析工作，他们只把跨国关系粗略地定义为“不受各国政府中央外交政策机构控制的那些跨越国家边界的联系、联盟与互动行为”（见[美]基欧汉、奈著：《跨国关系与全球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念化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是古勒维奇（*Г. А. Гулевич*）。古勒维奇早在1956年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一文，力主人们避免只从传统的国内政治透视国际关系变迁的“第二种设想”模式，也即不要只把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为国内政治的衍生。古勒维奇主张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这就是其所说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перевернутая вторая гипотеза*）解释模式。^①古勒维奇此后在1965年出版的《艰难时代的政治：各国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进一步把各国国内经济策略与选择置于国际背景下认识，对国际力量压力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变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堪称为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结合的典范之作。^②《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在基本分析框架上，按照编者在导论中所坦陈的，正是严格建立在古勒维奇“颠倒的第二种设想”（或“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基础上的。^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行进的全球化浪潮，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更多地暴露于外部世界面前，堪似“无形之手”的国际力量迫使更多的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内部变革与调整。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结为一体的跨国关系研究非但没有衰微，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下，其研究可谓与时俱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这本《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以外，伊文斯（*John A. Evans*）、雅各布森（*John A. Jacobson*）、普特南（*Robert A. Putnam*）1985年联袂编辑的《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以及里斯—卡彭（*Robert A. Liska*）1989年编辑的《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非国家行为体、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堪为20世纪80年代跨国关系研究最重要的三本

① *Г. А. Гулевич* “Перевернутая вторая гипотез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рн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1956, № 1, с. 1-10.

② *Г. А. Гулевич*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в услов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зиса”,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65, № 1, с. 1-10.

③ *Г. А. Гулевич*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85, № 1, с. 1-10.

代表作。^①

跨国关系研究范式在理论上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该研究范式是在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解释范式进行反叛和颠覆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国家”这个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遭遇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的多元政治理论和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理论的质疑。^② 政治学分析中以“国家”这个概念为解释中心已日渐式微，换言之，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而非国家本身，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中心。这种学术上的转向同样波及到国际关系研究。20世纪70和80年代，一大批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并对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为人注目。^③ 许多国际现象如果仅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的认知途径出发，已经很难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实主义只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有时甚至是惟一的认知对象，在很多学者看来已经概括不了国际关系的内容和真相。“去国家”一时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一方面关注全球政治层次上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次国家层次上国内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党派在国家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的第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家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一的行为体，国家也非具有独立的“人格”意义，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不简单地只是“国家”的行为，而是国内各种行为体互相博弈、妥协的表现。并且，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的国内政治是等级制（等级制）的看法不同，该模式认为国内政治是平行的多头政治（多头政治），各种行为体的偏好不同，行为也不同，它们共同分享着决策的权力。普特南在《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之逻辑》一文就

① 更多的相关研究文献概况还可以参考：迈克尔·曼：《跨国资本主义与全球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② 参考 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詹姆斯·R. 马基：《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③ 参见苏长和：《非国家行为体与当代国际关系》，载《欧洲》（北京）1995年第1期；苏长和、朱鸣：《世界政治中的跨国利益集团》，载《现代国际关系》（北京）1995年第5期。

